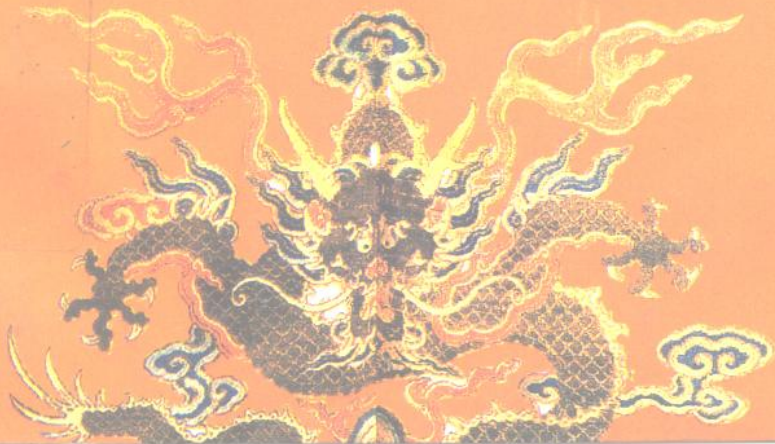




王市思维

周毅之 米寿江 严翊君 •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毅之 米寿江 严翹君 •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101号

责任编辑	李 卫
封面装帧	王建纲
封面封底形拓	高 龙

帝 王 思 维

周毅之 米寿江 严翹君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5.75 插页 2 字数 124,100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208—01475—2/B·181

定价 5.40 元

前 言

张桂岳

中华民族不仅以勤劳勇敢著称于世，而且以睿智聪慧名闻于天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继承传统思维的优秀成分，溶于时代精神之中，对于当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这种研究应当既是唯物辩证的又是历史的、具体的。尤其是对漫漫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既要研究代表民族精萃、合乎历史潮流的思维，也要研究对历史发展起腐蚀和阻碍作用的思维。对各色人等由其社会经济政治和职业地位所决定的不同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既要宏观鸟瞰，又要着力微观刻意，具体地剖析具体的阶级、阶层和人物的思维特征，从中吸取思维经验。诸如象征封建统治的帝王思维，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深层意识的士(知识分子)思维等等。他们的思维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深刻地显示中国人思维的传统特色，影响深广，很值得我们研究。本书就是其中的一种。

一九八九年二月于石城

绪 言

历史上的中国人，与皇帝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在漫长的中世纪，西方人拜倒在上帝面前，中国人拜倒在皇帝脚下。是“仰赖皇恩”，中国人才活着，才感觉，才思考，因此，“头脑”也就不能属于自己。

在数千年的宗法社会中，“吾皇圣明”这是一条公理。就象在欧氏几何中，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两条平行线永不相交等等一样，是绝对无须证明的公认的法则。它是理性的前提，而不是理性的结果。秦王言法，于是天下人皆言法，凡说礼教的书都烧，凡倡孔学的人皆杀。汉帝言孝，于是天下人皆言孝，选官也谓之“举孝廉”，忤逆子也装“孝”顺礼。梁武帝言佛，于是国中人皆言佛，大官们为他四次“赎身”，花钱几万亿。唐代天子好言道，于是天下人就拜老子李耳。这是李耳占了唐天子也姓李的光。由此这个“李”字就带上了神秘的色彩，连鲤鱼也获殊遇，再也吃不得，只供放生。唐天子里曾有几个开明大胆的，雄视八方，对境外之物兼收并蓄，一时出现了“多少闾放”。于是国中人都“开放”起来，歌胡声，舞胡舞，衣胡衣，学着胡人挽高髻、挑鬟、点绛唇、贴花钿者层出不穷。“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全不亚于现在穿牛仔裤、跳迪斯科、听流行音乐。可是到了晚清，“欧风美雨”虽然猛烈，由于西太后恪守祖宗的规矩，弄得

民国以后也有人不敢或舍不得剪掉头上的长辫子，只是把它盘了上去的。

臣民的衣食仰赖君王的“天恩”，臣民的思维也仰赖君王的赐与。帝王思维，从来就是臣民思维的终极依据，是臣民思维运转的推动机制，信息的中心来源，逻辑程序的最高前提。帝王思维的脑袋，是万民百姓“脑袋中的脑袋”。有了这个“神圣的脑袋”，万民百姓便不能再有也不再需要“自己的脑袋”。这种思维中的社会，是一个千百万身躯加一个脑袋的“怪物”。这个“怪物”历经数千年，就象达摩面壁最终把自己的影子留在石上一样，把自己的身影留刻在中国人思维的深层基石上。

中国人也骂皇帝，而且骂得很绝，谓之“昏”。中国老百姓往往不明底细，凡叫自己遭殃的一概骂之为“昏君”。这个“昏”字，不指别的，乃是说思维昏乱，昏聩不治。《说文》中解道：“昏，日冥也。”指落日已没，满目昏黄，暮霭沉沉，天地混沌，于是便不明真伪，不察是非，失谋而谬断，或暴或残，或弱或乱，老百姓越发遭殃。然而，骂是骂了，终究还是忍着，必要时还得随大流欢呼“吾皇圣明”。亦或有一个两个揭竿而起，取而代之者，免不了也还是要“昏”，于是人们再来骂一番，忍耐一番，等待“气数尽”、“山陵崩”。何以只是骂，只是忍，只是等待，而不曾想到过利用一下自己的脑袋？因为人们在自己思维的最深处从来就没有怀疑过整个社会只能用一个脑袋思维，因而不曾有过用自己脑袋思维的程序构造。于是“昏”了一个，便期盼下一个，圣明和权威永远属于“这一个”。这便是历史上中国人思维的悲剧之所在，也是中国人思维的痛苦之所在。

中国人的思维，必须从这个悲剧中挣脱出来。如果说中

国人已经有了、并正在推进着政治的大解放，那么这一思维的大解放，就意味着在中国人的思维的深层基石上抹去帝王思维的阴影，抹去“千百万个身躯加一个脑袋的怪物”的阴影。因为，正是这种帝王思维，曾以“奉天承运”的至尊意识，带着至高无上的神圣灵光，封闭了全社会的思维天地；以其特有的“子民”观念否定了臣民的主体意识，使他们普遍失落了“自我”，以其“中央大国”的一统观念，封锁了全社会的视野，使全社会的思维在一潭死水中迅速沉淀而凝固。正是这种帝王思维，以“天子”的角色实行着对“天”的最高模拟，因而本能地排斥理性和科学，崇尚原始的直觉；而这种原始的直觉又钝化了中国人思维的锋芒，梦幻般地皈依于富于神秘色彩的“天子”的思维。正是这种帝王思维，以帝王的意志否定了天下人的意志，以帝王的独断取代了天下人的智虑，以帝王的专横取代了天下人的思考，于是，不管是真的也好，假的也好，所有的臣民都做了“愚民”。正是这种帝王思维同样受着与任何一个普通人毫无二致的潜在欲望的冲击，这种本来是极为平庸的对生的追求、对死的恐惧、以及攻击性的冲动等等，在思维中所激起的层层浪花，在这里突然变得无比的神圣，于是一人之喜可以命普天同庆，一人之悲可以令天下同悲，一人之怒可以使天下殛殛，一人之愁可以使天下人惶惶。正是这种君王思维，在帝王家族、权臣和宦官的包围中，越发成了封闭圈中的封闭圈，它从这个封闭的环境中不断吸收凝固剂，强化着自身的封闭性，巩固着“家天下”的观念，浸染上更多的神秘化的色彩；它依靠这个包围着自身的环境，不断地放大着自身的封闭性，保障着君王的思想、意识、情感、意志对全社会臣民的思想、意识、情感、意志的更彻底的否定。

帝王思维，作为特定的思维现象，是古老的农耕文明的产物。漫山遍野而又相互独立的小农经济个体，需要有一个绝对“圣明”的“天子”来聚拢他们，实现“大一统”。在这种社会中，个人特权和社会权力的直接合一，从而使某一个人的思维获得了绝对的神圣和绝对的权威。随着封建帝王制度的覆灭和工业化的到来，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这种思维方式的社会经济基础早已瓦解。但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思维模式，往往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并且有可能改头换面以别的形式注入新的社会机体。尤其是象中国这样一个长期是小农经济汪洋大海的封建农业国，尽管社会制度早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诸如像“个人崇拜”之类的封建意识依然存在，甚至一段时期内还曾经泛滥成灾。因此，在今天，人类社会正向21世纪文明发展的时候，对帝王思维的来龙去脉，及其特点和社会土壤作一分析和研究，还是有其理论价值的。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在帝王思维的源头	1
一、首领思维与“神”思维的合一	1
二、性崇拜与血缘权威意识的形成	7
三、传说中“厚生”、“利民”的恩赐意识	11
四、原始思维中的整体和秩序	16
第二章 从脱胎到定型	21
一、君王思维的野蛮期	22
二、君王思维的人文期	31
三、君王思维的哲学期	39
第三章 皇极意识	45
一、皇极意识的积淀	45
二、皇极的意识中心功能	48
三、民本意识及其下意识	55
四、皇极意识与“天朝上国”观念	61
第四章 “圣明”的直觉	69

一、“受之于天”的“感性直觉”	69
二、对理性本能的排斥	74
三、对天的最高模拟	78
四、微妙的模糊	82
第五章 专横的意志	86
一、运天下于我股掌之中	86
二、“无所不可为”、“无所不能为”	90
三、无端的猜疑	94
四、无意志	98
第六章 肆虐的情感	102
一、最神圣和最平庸的欲望	102
二、天下随我喜怒	106
三、恣意宣泄	109
四、文情与政治	112
五、气乱则智昏，不可以为政	115
第七章 帝王思维的家族圈	119
一、家族圈中的帝王思维角色	119
二、悲剧之一：走向封闭和平庸	122
三、悲剧之二：心态失衡	126
四、悲剧之三：走向冷酷	131
第八章 帝王思维的代劳人	134
一、有限思维能力的窘迫	134
二、“三公”论道	136

三、“内阁”的头脑.....	143
四、宦官的“手”.....	148
五、作茧自缚.....	153
第九章 帝王思维的文化土壤.....	154
一、孵化帝王思维的温床.....	154
二、修补帝王思维的胶粘剂.....	161
三、传统文化土壤的崩裂.....	167
后 记.....	171

第一章 在帝王思维的源头

中国帝王思维的体系，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随着中国特定的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完善的。为此，我们有必要首先上溯君王思维的源头——中国上古社会原始首领的思维。因为后世君王的一切思维特征，在那里就已经有了初始的基因。

一、首领思维与“神”思维的合一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谁不惜殒首折腰，夺得如此多娇的江山，谁就是这个国家的至高无上者。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朱元璋、爱新觉罗，在他们的思维中，无不充满了绝对至上的权威感、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意识、处于社会巅峰而统摄天下万物的心理经验。称“孤”道“寡”，这是谦词；独夫民贼，这是骂词，其中无不浸透着“唯一”的意识。

中国君王思维中的绝对至上意识，在上古社会原始首领思维中便已存在了。它的肇端便是原始首领思维和“神”思维的合一，而其外在形式即体现为“神”权威系统与原始首领权威系统的合一。这在上古世界的各个文化圈中是独特的。

纵观世界各种古文化圈的原始宗教、神话和传说中的

“神”权威系统，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只有对自然物的崇拜，没有独立的神谱体系；第二种类型，有独立的神谱体系，并且与人世间的权威体系互相分立；第三种类型，有神的神谱系，但是这个神的神谱系是和帝王谱系合一的团体结构。第一种类型主要是原始初级阶段的自然宗教，如近山则崇拜山，近河海则崇拜水，古埃及崇拜公牛为丰产神，古婆罗门崇拜苏摩的蔓草为酒神，早期恒河流域的雅利安人则崇拜天神、火神、日神、雷神、雨神、风神。直至近代，这种自然崇拜仍在一些原始土著居民中存在。奥马哈的印第安人挖出可以在蒸汽浴中治疗牙痛、耳痛、关节炎的“皂草”，好象挖出了一种圣根，因而在掘出的洞里留下一撮烟叶，往往还留下一把刀或一些线，采集者口中念念有词，“我拿了您给我的东西，我把这些东西留给您，我希望长命百岁，并希望我和我全家无灾无祸。”^①在这种原始的自然崇拜中，当然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神谱体系。一般说来，处于这种自然崇拜阶段的人类都要继续向前发展，从而步入后两种类型。

第二种类型的代表是古希腊。在古希腊的宗教和神话传说中，“神”自成体系，自有谱系，与人世间的“王”者系统完全分立。他们组成一个“神”的社会，居住在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首领是宙斯，他以雷电作武器，维持着宇宙间的秩序。宙斯的妻子是女神希拉。他们的儿子赫费斯托斯是火神和锻冶之神，是冶炼术与锻造匠的保护者。宙斯与其他女神生下的儿女有：太阳神阿波罗，是正义和艺术文学的保护神；阿尔特美斯是月神和狩猎之神；赫尔美斯是商业和通讯之神；阿莫洛提是美神和恋爱之神；阿瑞斯是战神。全副武装从宙

^① 参见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第52页。

斯头脑里“长”出来的雅典娜，是智慧女神，后来成为雅典城邦的保护神。宙斯的兄弟波塞顿是海神，哈德斯是幽冥神。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不是人间的统治者。这种独立的神谱体系的存在，表明在古希腊人的思维中存在着一个与人间权威系统相互独立的神权威系统。奥林匹斯山上诸神也对人间享有权威，但是这种权威与原始氏族首领、与英雄时代的议事会、元老、国王无关。神会加福于人，也跟人恶作剧，但决不是转化或体现为部落首领的意志，决不通过人间“权威”系统去实现。宙斯和人间的妇女生了个赫拉克利斯，为民除害，有十二件大功，他是道地的“天子”，但却不是人间的首领，不是国王，只是一个英雄，一个大力士，他在摇篮中就扼杀了两条巨蟒。嫉妒女神厄利斯仅仅是因为自己没收到阿喀琉斯父母的婚礼的邀请，便在婚礼席间扔下“不和的金苹果”，引起后来绵延十年多的特洛伊战争，这决不同于人间“权威”系统秉承神意去发动一场战争。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给人间，使人间获得大进步，但是并没有因此成为人间的“王”。宙斯不仅没有赐给普罗米修斯统治人间的“权威”，反而把他钉在高加索山上，每天放恶鹰来啄食他的肝脏。

这种与人间权威系统相互独立的自成体系的神权威系统，在原始的首领思维中层层积淀下来，从而使他们的思维构架中，比肩耸立着两个“权威”系统：一个是人世间“权威”系统，一个是“神”“权威”系统。两个“权威”系统的比肩耸立，使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获得“绝对”和“至上”的地位，尤其是人世间的“权威”系统，更不可能有这样的地位。古希腊神话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国王坦塔罗斯受到神的惩罚，浸在齐颈的湖水中，身旁有果树，他低头喝水，水却退去，伸手取果，树就避开。这在中国上古“帝王”的身上是不可能发生的

事。但同时，人间的英雄也可以打败神，《荷马史诗》中甚至咒骂神“给可怜的人以恐惧和痛苦，神自己却是幸福无忧地生活着。”这种两个“权威”系统相对并立、相互箝制的图式，在古希腊人，尤其是他们的领袖思维中深深积淀下三种意识：一是“权威”非绝对的意识。宙斯虽然是主神，但是同样遭到人类的嘲笑和咒骂，而且常犯专横、残暴等“凡人”的毛病，并非任何时候都绝对神圣、绝对英明。人间的国王，毫无疑问更不能拥有绝对的权力。二是“权威”可制约的意识。没有绝对的“权威”和绝对的英明，自然也就会产生相互控制意识，在他们的思维深处，两个比肩耸立的“权威”系统决定了难以滋生出关于不受制约的“权威”的观念。这就为人的思维、特别是后世的政治思维的理性化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前提，只有能制约的政治，才是理性的政治。三是人世“权威”系统非神圣的意识。因为与之比肩的还有一个“神”的“权威”系统，人间“国王”的意志和行为绝对不能再直接表现为“神意”，因而也就不能享有神圣而又神秘的迷人光圈。这不仅为后世君王，甚至为这一整个文化圈内人的思维理性化提供了重要的建构要素。

第三种类型的代表便是上古中国。与古希腊不同，在中国的上古社会，存在的只有一个通贯天、地、人三者之道的“王”的权威系统。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集人间权威系统与“神”权威系统于一体的权威系统。

中国上古社会原始宗教发展的基本线索，乃是从鬼魂崇拜发展为祖宗崇拜，继而祖宗崇拜又和帝王世系崇拜结合在一起。据《礼记·祭法》称：“有虞氏祀黄帝而郊，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祀黄帝而郊，祖颛顼而宗禹；殷人帝舜而郊，祖契而宗汤；周人祀舜而郊，祖文王而宗武王。”夏、

商、周三代当然已不是原始的非等级制社会。但其祭法毕竟是紧承有虞氏而来，袭上古之成制。这里所祭祀和崇拜的对象，除了汤、文王、武王，皆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传说中的上古社会氏族或部落的始祖、首领，并有大功于本氏族或本部落。他们组成了一个系统，形成一个谱系，既是被祭祀的祖先的谱系，又是世袭帝王的谱系。

原始宗教中的这一谱系，又和远古神话、传统中的神的神谱系相合一。在神话传说中，神的神谱系，就是帝王谱系的神化。按《艺文类聚》排列有：

天皇氏，“天地立，有天皇，十三头，号曰天灵，治（统治）万八千岁”。

地皇氏，“地皇十一头，治八千岁”。

人皇氏，“人皇九头，兄弟各三百岁。依山川土地之势，财度为九州，各居其一方，因是而区别”。

有巢氏，“上古皆穴处，有圣人教之巢居，号大巢氏”。

燧人氏，“燧人为燧皇，”“燧人始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疾。”

太昊庖牺氏，“始作八卦，结绳为网罟，教人渔猎”。

帝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苍天”。

炎帝神农氏，“始教天下种谷”。

再其下便是黄帝轩辕氏、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禹夏后氏。

以上谱系中的所有角色，都是造福人类，备受崇拜的神，但又都是统治天下、享有人间权威的“帝王”。除此而外，既没有一个独立的神的神谱系，也没有一个独立的帝王谱系。对此，董仲舒解释说：“古之人造文字者，三画而连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连中者，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

才而参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故王者必德天，以大仁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又养而成之。”^①董仲舒之言虽属虚拟，但却准确地表述了沉积在中国人思维深处的一种意识：唯有王，才能通天、地、人之道，才能“取天、地与人之才而参之”，唯有帝王系统才是天、地、人即宇宙万物中的唯一的、别无比肩的权威系统。这一权威系统，在上古先民特别是在他们首领的思维中高高耸立，为后世的君王思维留下了与古希腊完全不同的建构要素。

从这个源头延伸出来，首先产生的是权威不可分的观念。因为权威是“唯一”的，是通天、地、人而贯宇宙万事万物的核心体系，是“非王者孰能当是”的唯一者，因此在人们的思维里，只有此而没有彼，只有“一”而没有“二”，只有“最高”而无“比肩”。这种思维模式在氏族社会中可以有效地维持整个氏族为一个和谐的整体，而进入到了等级制社会，则立即成为皇权至上、皇权不可分的重要思维基础。

其次，产生了权威不受制约的观念。唯一的权威系统自然不受制约，因而作为思维对象物在观念意识中越来越带上“绝对”、“至上”的色彩。传说中的中国上古社会中的“帝王”确也为本氏族或部落“鞠躬尽瘁”，也总是在氏族中“最”为英明，所以这种观念也不断得到鼓励。而到等级社会里，这种见识却为皇权不受制约、人治排斥法治提供了思维基础。

再次，产生了世俗权威神圣化的意识。因为再没有一个独立的外在的“神”的权威系统，于是，“王”权威系统便兼有了“神”权威系统的功能，环上神圣而又神秘的光圈。进入文明社会，这种意识就演变为君权神圣的思维基础。这不是

^① 参见《艺文类聚》卷十一。